

watch| 上证观察家

金融全面开放要突破制度性垄断瓶颈

□ 易宪容

WTO是一个制度锚,它向国内决策者提供了对经济制度采取重大改革的一个动机,不仅促使了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也加快了其全面改革及制度质量的全面提高。当然,这些开放、改革及新制度规则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中国金融业已有的条件与基础之上,即必须面对这种金融业改革的初始条件。

不过,WTO作为一个参考系,一种标准,它成了推动近5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种动力,也促进了中国金融业迈出了成长与繁荣的重要一步。正是这一步使得中国金融业自入世以来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如银行业的不良率迅速下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三大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成功及上市、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引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等,如国内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成功、QFII进入、证券市场一些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国内股市新的繁荣等,如保险业率先全面开放与快速发展等。

尽管这些成绩非常显著,但与现代经济开放条件下与发达市场下健康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金融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瓶颈或制度障碍。如果不突破这些制度瓶颈或制度障碍,那么中国金融改革仅是解决了一些表象问题,却掩盖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社会治安”隐患 源于收入差距和腐败

□ 周迪

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党政领导干部学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腐败”、“社会风气”、“失业”等位于二至五位。

的确,今年恶性治安事件接连发生:甘肃临夏法院庭院长一家四口被杀、贵州省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惨遭灭门等事件,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强化社会治安就能解决这一问题,有可能陷入误区。

历史证明,收入差距的大小与社会治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社会治安问题就比较严重;当收入差距很小的时候,社会治安就非常良好。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当社会治安问题成为领导干部眼中最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同样是比较严重的。民众对收入差距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行业导致的收入差距。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5—10倍。

其二,腐败导致的收入差距。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通过权力资源换取巨额经济利益,近年来被揪出来的贪官,动辄贪污、受贿数百万、千万乃至数亿元,严重损害了领导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同时,一些官员也将权力向其家族成员延伸,使其家族共享权力带来的好处,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制造收入差距。

这两种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都容易引发不满乃至愤怒。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往往是建立在公众利益被剥夺的基础之上的;官员通过权力腐败牟取财富的行为,常常以牺牲民众利益、社会运行效率、分配公平乃至法律尊严为代价,是所有导致收入差距因素中,最容易引起公愤的因素。

“社会治安”恶化恰好说明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只有正视收入差距和腐败等因素,并认真地加以解决,才能真正对社会治安问题釜底抽薪,治安的好转才能成为现实。

尽管中国金融业自入世以来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但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瓶颈或制度障碍。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制度瓶颈就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主导与垄断,就在于政府部门手中的权力制衡不足,就在于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开始用制度化的方式来侵害消费者。如果不突破这些制度瓶颈或制度障碍,那么中国金融改革仅是解决了一些表象问题,却掩盖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正如一向指出的那样,在加入WTO以来的5年过渡期,尽管在WTO为制度锚的情况下,给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给中国制度质量的改进做出具体地规定,从而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也提高了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但正如我多次撰文指出,国内金融改革可以引入国外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规则、产品与市场,但是让其内在在机制、银行文化及银行价值观的改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没有后者的变化,国内金融体系要想真正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国内金融改革要达到形似与神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特别是从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来看,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一个健全、完善的优质制度结构仍相去甚远。在一个良好的金融制度框架中,这种制度安排不会让少数人或阶层对某一个具体行业或活动实行垄断,也不会让少数人对自然资源享有特殊权利而获益。所以,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以此来推动该行业发展,让所有的产出贡献所产生的相关利益。还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伴随着好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不能被广泛分享又受到严格制衡,使得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可以获取个人利益的空间。

以该理论来关照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现,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包括它的组织结构、财务报表、金融产品推出、市场方式安排等可能会做得惟妙惟肖,但其运作的内在机制、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及文化等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现代化及市场化与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主导性、聚集性等相结合时,那么国内金融机构不仅容易聚集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并按照政府愿意把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要发展的产业或行业,而且也有利于既有金融机构将其运作的成本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并让运作收益趋于单位化及个性化。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政府将在2007年重点解决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被置于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公众不仅不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不得不承受房价、教育、医疗以及水、电、天然气等价格上涨之苦。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抑制了消费。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对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定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扩大内需,就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而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把增加民众收入放在第一位。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现实国强富民,现在国家日新月异了起来,但民还不够强。一个最直观的数据是,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以2005年为例,中国当年的GDP是18.5万亿元,工资总额是4万亿元,两者之比是22%。而美国同期,GDP与工资总额之比是58%,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超过一半用到了国民收入方面,而我们主要用在了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事实上,凡是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追求国民收入与GDP的大致同步增长。以日本为例,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国民收入的增加不

仅使他们能够暂时填补社会保障体系缺口留下来的空白,使民众安居乐业,提高敬业精神,也扩大了内需,内需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使日本经济得以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工资的1/24。在劳动力价格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所谓优势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首先,如果民众收入增长缓慢,阻碍内需拉动。其次,导致

品,而仅是为保险公司提供谋利的市场交易品,那么这种责任险的意义又有多大?还有,这种责任险有法律依据,那么其以公共品的强制方式来强迫消费者消费,那么其公共品的定价是如何进行的?程序上合法吗?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程序的合法性上还是第三者责任险的定价上,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角度来公平公正的定价。反之,借手中的公权力仅是为本行业的利益服务,完全是一种损害消费者的产品定价。也就是说,保险监管部门借助于公权力来谋取行业利益,来谋取自己部门利益。这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借公权力把这个侵害与掠夺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制度化与合理化,也是对公权力的一种严重侵害。

可以说,目前中国金融来各职能部门,正在借助于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及法律不了解,借助于技术上、信息上、政策上等方面的不对称,并以此制定一些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制度,从而把一些对消费者利益侵害与掠夺的制度化与“合理化”。这也正是目前阻碍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障碍。

总之,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制度瓶颈就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主导与垄断,就在于政府部门手中的权力制衡不足,就在于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开始用制度化方式来侵害消费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增加国民收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

□ 魏也



仅使他们能够暂时填补社会保障体系缺口留下来的空白,使民众安居乐业,提高敬业精神,也扩大了内需,内需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使日本经济得以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工资的1/24。在劳动力价格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所谓优势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首先,如果民众收入增长缓慢,阻碍内需拉动。其次,导致

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一大软肋

□ 殷剑峰

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威胁既不主要来自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不主要来自城镇居民中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同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地位恶化有关。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事实:以IT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惠及为数众多、连字都不认识的穷人,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长期存在的这种状态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便是使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

如果说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它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真正的软肋就在于这个日趋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与人们的直觉不同,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威胁既不主要来自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不主要来自城镇居民中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同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

地位恶化有关。根据我们对已经公布数据的测算,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民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自1996年以来,不仅城乡居民的财产收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而且更加关键的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

下降至不到24%。在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的同时,近些年来唯政府部门的收入是相对上升的,而政府部门的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税收收入,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生产税收入。这种居民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其一,政府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政府的投资活动,而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由于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投资活动的效率令人怀疑,而且,政府对投资的热衷也是经济时有过热之虞的根源;其二,

如果严格依法行政,恐怕鲜有航空公司能逃脱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折令”的荒诞,当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可能违规的时候,更应该反省的是航空公司还是法规制定者自身?春秋航空的一元机票,走的是国外廉价航空的路子,即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客源。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营模式。以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为例,在美国航空业连年亏损的环境下,它近年却连连获利,其市值已高达109亿美元。我们有什么理由遏制我国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

而且,春秋航空推出的一元票价,并非真正的一元,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乘客实际上支付的是151元,假若不是如此之高的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支撑,春秋敢推出一元机票吗?面对一元机票,有关部门不妨反省一下自身问题,而后再做处罚决定。

济南春秋假日旅行社因销售1元机票,被济南市物价局处以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济南市物价局对春秋作出处罚的依据是民航总局2004年4月20日出台的机票“限折令”: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严格限定市场定价的做法本身就非常值得商榷。

实际上,如果严格依照民航总局的规定,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违反了“限折令”,有些航空公司三折、二折的广告,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只处罚春秋这一民营企业,有专拣软柿子捏的嫌疑。虽然我们不敢就此断定有关处罚涉嫌打压民营企业,但这种做法本身,确有可能抑制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强化航空垄断。

因而,为了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推动了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政府储蓄率在这些年的大幅度上升是造成整个国民储蓄率上升乃至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其二,劳动报酬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抑制了居民部门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高投资和贸易顺差,更加重要的是,这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甚至要比通常意义的技术进步重要得多。

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此,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灵活性已大大增强,对不可避免且难以预测的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已大大增强,因而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日前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向我们揭示的一幅经济发展图景。

数据显示,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控制。广义货币(M2)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6.83%、17.1%和16.8%,又分别比去年同期低1.09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尤其是11月份M2增速有所下降,是当月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使得货币乘数明显下降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新增人民币贷款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少增1252亿元、94亿元和315亿元。新增人民币连续三个月同比少增,表明贷款增长过快势头已得到明显控制。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在今年前三季度、1-10月和1-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了28.2%、26.8%和26.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回落,是今年以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果之一。事实上,从工业生产指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这一重要指标回落也可以证实投资需求增长在放缓。工业生产指数在今年前三季度、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7.2%、14.7%和14.9%,表明工业生产指数与投资增速一样也呈平稳下降趋势,显示出下半年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性经济指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今年9月份达到57%高点后,10月份PMI指数回落到

54.7%,比上月下降2.3个百分点。这一小幅回落的趋势恰恰是与投资增速及工业生产指数平稳回落走势一致的。

但是,11月份PMI指数为55.3%,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投资、信贷增速回落的趋势是背离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考虑到PMI指数从去年1月起已连续23个月高于50%,PMI指数并没有出现深幅下降,表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仍处于增长的景气周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值得期待。

另外,由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两项指标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9月和10月份实现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9.6%和30.1%,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这2个月分别为186.45(同比提高16.96点)和187.29(同比提高17.12点)。这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稳步提高。

这说明,在投资、信贷增速下降,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已取得积极成效的情况下,一系列经济指标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面对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而且也显示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正在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点击 Blog

违规者众,为何仅罚春秋

□ 冯光明

如果严格依法行政,恐怕鲜有航空公司能逃脱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折令”的荒诞,当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可能违规的时候,更应该反省的是航空公司还是法规制定者自身?春秋航空的一元机票,走的是国外廉价航空的路子,即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客源。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营模式。以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为例,在美国航空业连年亏损的环境下,它近年却连连获利,其市值已高达109亿美元。我们有什么理由遏制我国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

而且,春秋航空推出的一元票价,并非真正的一元,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乘客实际上支付的是151元,假若不是如此之高的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支撑,春秋敢推出一元机票吗?面对一元机票,有关部门不妨反省一下自身问题,而后再做处罚决定。

济南春秋假日旅行社因销售1元机票,被济南市物价局处以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济南市物价局对春秋作出处罚的依据是民航总局2004年4月20日出台的机票“限折令”: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严格限定市场定价的做法本身就非常值得商榷。

实际上,如果严格依照民航总局的规定,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违反了“限折令”,有些航空公司三折、二折的广告,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只处罚春秋这一民营企业,有专拣软柿子捏的嫌疑。虽然我们不敢就此断定有关处罚涉嫌打压民营企业,但这种做法本身,确有可能抑制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强化航空垄断。

因而,为了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推动了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政府储蓄率在这些年的大幅度上升是造成整个国民储蓄率上升乃至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其二,劳动报酬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抑制了居民部门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高投资和贸易顺差,更加重要的是,这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甚至要比通常意义的技术进步重要得多。

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此,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voice| 上证名记者

中国经济增长“向好又快”

□ 乐嘉春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灵活性已大大增强,对不可避免且难以预测的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已大大增强,因而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日前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向我们揭示的一幅经济发展图景。

数据显示,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控制。广义货币(M2)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6.83%、17.1%和16.8%,又分别比去年同期低1.09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尤其是11月份M2增速有所下降,是当月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使得货币乘数明显下降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新增人民币贷款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少增1252亿元、94亿元和315亿元。新增人民币连续三个月同比少增,表明贷款增长过快势头已得到明显控制。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在今年前三季度、1-10月和1-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了28.2%、26.8%和26.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回落,是今年以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果之一。事实上,从工业生产指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这一重要指标回落也可以证实投资需求增长在放缓。工业生产指数在今年前三季度、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7.2%、14.7%和14.9%,表明工业生产指数与投资增速一样也呈平稳下降趋势,显示出下半年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性经济指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今年9月份达到57%高点后,10月份PMI指数回落到

54.7%,比上月下降2.3个百分点。这一小幅回落的趋势恰恰是与投资增速及工业生产指数平稳回落走势一致的。

但是,11月份PMI指数为55.3%,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投资、信贷增速回落的趋势是背离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考虑到PMI指数从去年1月起已连续23个月高于50%,PMI指数并没有出现深幅下降,表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仍处于增长的景气周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值得期待。

另外,由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两项指标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9月和10月份实现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9.6%和30.1%,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这2个月分别为186.45(同比提高16.96点)和187.29(同比提高17.12点)。这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稳步提高。

这说明,在投资、信贷增速下降,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已取得积极成效的情况下,一系列经济指标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面对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而且也显示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正在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点击 Blog

违规者众,为何仅罚春秋

□ 冯光明

如果严格依法行政,恐怕鲜有航空公司能逃脱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折令”的荒诞,当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可能违规的时候,更应该反省的是航空公司还是法规制定者自身?春秋航空的一元机票,走的是国外廉价航空的路子,即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客源。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营模式。以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为例,在美国航空业连年亏损的环境下,它近年却连连获利,其市值已高达109亿美元。我们有什么理由遏制我国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

而且,春秋航空推出的一元票价,并非真正的一元,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乘客实际上支付的是151元,假若不是如此之高的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支撑,春秋敢推出一元机票吗?面对一元机票,有关部门不妨反省一下自身问题,而后再做处罚决定。

济南春秋假日旅行社因销售1元机票,被济南市物价局处以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济南市物价局对春秋作出处罚的依据是民航总局2004年4月20日出台的机票“限折令”: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严格限定市场定价的做法本身就非常值得商榷。

实际上,如果严格依照民航总局的规定,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违反了“限折令”,有些航空公司三折、二折的广告,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只处罚春秋这一民营企业,有专拣软柿子捏的嫌疑。虽然我们不敢就此断定有关处罚涉嫌打压民营企业,但这种做法本身,确有可能抑制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强化航空垄断。

因而,为了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推动了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政府储蓄率在这些年的大幅度上升是造成整个国民储蓄率上升乃至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其二,劳动报酬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抑制了居民部门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高投资和贸易顺差,更加重要的是,这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甚至要比通常意义的技术进步重要得多。

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此,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乐嘉春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灵活性已大大增强,对不可避免且难以预测的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已大大增强,因而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日前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向我们揭示的一幅经济发展图景。

数据显示,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已得到控制。广义货币(M2)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6.83%、17.1%和16.8%,又分别比去年同期低1.09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尤其是11月份M2增速有所下降,是当月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使得货币乘数明显下降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新增人民币贷款在9月、10月和11月份分别少增1252亿元、94亿元和315亿元。新增人民币连续三个月同比少增,表明贷款增长过快势头已得到明显控制。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分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在今年前三季度、1-10月和1-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了28.2%、26.8%和26.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回落,是今年以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果之一。事实上,从工业生产指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这一重要指标回落也可以证实投资需求增长在放缓。工业生产指数在今年前三季度、10月和11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7.2%、14.7%和14.9%,表明工业生产指数与投资增速一样也呈平稳下降趋势,显示出下半年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性经济指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今年9月份达到57%高点后,10月份PMI指数回落到

54.7%,比上月下降2.3个百分点。这一小幅回落的趋势恰恰是与投资增速及工业生产指数平稳回落走势一致的。

但是,11月份PMI指数为55.3%,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投资、信贷增速回落的趋势是背离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考虑到PMI指数从去年1月起已连续23个月高于50%,PMI指数并没有出现深幅下降,表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仍处于增长的景气周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仍值得期待。

另外,由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两项指标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9月和10月份实现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9.6%和30.1%,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这2个月分别为186.45(同比提高16.96点)和187.29(同比提高17.12点)。这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稳步提高。

这说明,在投资、信贷增速下降,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已取得积极成效的情况下,一系列经济指标不仅显示了中国经济面对各种冲击的自我调节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而且也显示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正在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点击 Blog

违规者众,为何仅罚春秋

□ 冯光明

如果严格依法行政,恐怕鲜有航空公司能逃脱处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限折令”的荒诞,当几乎所有航空公司都可能违规的时候,更应该反省的是航空公司还是法规制定者自身?春秋航空的一元机票,走的是国外廉价航空的路子,即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客源。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营模式。以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为例,在美国航空业连年亏损的环境下,它近年却连连获利,其市值已高达109亿美元。我们有什么理由遏制我国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

而且,春秋航空推出的一元票价,并非真正的一元,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乘客实际上支付的是151元,假若不是如此之高的燃油附加费和机场建设费支撑,春秋敢推出一元机票吗?面对一元机票,有关部门不妨反省一下自身问题,而后再做处罚决定。

济南春秋假日旅行社因销售1元机票,被济南市物价局处以15万元的行政处罚。

济南市物价局对春秋作出处罚的依据是民航总局2004年4月20日出台的机票“限折令”:国内航线机票价格在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浮不得超过25%,下浮不得超过45%。在市场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严格限定市场定价的做法本身就非常值得商榷。

实际上,如果严格依照民航总局的规定,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违反了“限折令”,有些航空公司三折、二折的广告,现在还在网上挂着,只处罚春秋这一民营企业,有专拣软柿子捏的嫌疑。虽然我们不敢就此断定有关处罚涉嫌打压民营企业,但这种做法本身,确有可能抑制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强化航空垄断。

因而,为了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国民收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推动了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政府储蓄率在这些年的大幅度上升是造成整个国民储蓄率上升乃至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其二,劳动报酬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抑制了居民部门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高投资和贸易顺差,更加重要的是,这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甚至要比通常意义的技术进步重要得多。

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此,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